

## 譯者與他者：

### 以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為例

楊 承 淑<sup>\*</sup>

#### 摘 要

1920年7月6日至10月15日，29歲的佐藤春夫（1892-1964）來臺展開人生首度遠行，並進入長達三個月的深度探訪。旅途行遍中臺灣山地與中南部主要城市之外，亦曾於7月20日至8月5日之間跨海前往福建，遊蹤及於廈門、鼓浪嶼、集美、漳州等地。這趟臺閩旅途中，佐藤春夫幾乎在他所到之處都留下了文學的鴻爪。42篇旅遊紀行與小說創作在他訪臺後的翌年（1921）持續問世19年，直到昭和十四年（1939）。從旅遊的緣由與年紀，到相關書寫的出版期間、頻率、數量，都深刻反映出臺閩之旅在佐藤文學生命中格外不尋常的意義。

本文的研究焦點在於探索佐藤春夫臺閩書寫背後的導覽者與作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透過作品與作品中的譯者生平，考察兩者之間的作用關係。亦即，藉由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比較佐藤行走臺閩兩地之際，為他導覽的譯者及其譯事活動對於作家的文化探索與文學書寫產生的多面向影響。其中，包含譯者的個別背景與特徵及其導覽內

---

<sup>\*</sup> 作者現任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教授。

容、視角、態度、方式，乃至佐藤春夫自身的感受及其接受情況等。具體而言，本文將從佐藤春夫臺閩書寫的生產過程中，針對臺閩兩地不同譯者的行事活動與個人特質，探索譯者如何導引作家的目光投向其旅程，並對其旅遊地與當地人產生特定的敘事角度與內涵等作用因素。

尤其，透過佐藤春夫如攝影機般的敘事筆法，對於臺閩兩地三位譯者及其行事風格的書寫，藉由對照比較其中擔任規劃者、導覽者、隨行者角色的譯者與作家之間的交互作用。本文將以作品與史料為證，並以譯者與他者之間的互動與相倚為線索，探究他者如何透過譯者對於異國進行理解與接納，進而形成其自身的闡釋與言述；而譯者又如何透過他者的反饋與書寫，形塑其自身的形象與意義。

關鍵詞：殖民地之旅、南方紀行、森丑之助、許文葵、鄭（享綏）

## **The Translator and the Other:**

### Haruo Sato's Accounts of his Travels in Taiwan and Fujian

Yang Cheng-shu

#### Abstract

On July 6, 1920, the 29-year-old Haruo Sato (1892-1964) embarked on the first long-distance journey of his life. His trip, which lasted until October 15 of the same year, was a three-month in-depth visit to Taiwan, which took him to the mountains in central Taiwan as well as the citie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In addition, from July 20 to August 5, Sato also crossed the Taiwan Strait to visit Fujian, traveling to areas such as Xiamen, Kulangsu Island, Jimei, and Zhangzhou. Sato's literary footprint can be found in almost every location he visited, with 42 accounts and novels of his travels published over a period of 19 years, from 1921 to 1939. The motivations of his travels, his age during his trip, and the publication period, frequency, and quantity of his novels and accounts all indicate that this journ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ato's literary caree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uide and the author in Haruo Sato's writing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the text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e interpreters that appear in the text. Put another way, the interpreters who guided Sato on his trip, and their translations, had a variety of influences on Sato's cultural exploration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during his trip, which can be seen in his accounts of his travels in Taiwan and Fujian. These influences include the interpreters' individual backgrounds and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perspectives, attitudes, and methods of the guidance provided, all of which affected Sato's perceptions and level of acceptance. Based on Sato's process of writing his accounts of his travels in Taiwan and Fujian, this paper delves into how the activ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preters in Taiwan and Fujian differed, and how such differences influenced Sato's perspectives regarding his travels, as well as his descriptive strategies towards local peoples.

In particular, through Sato's eidetic style of narra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roles and styles of three interpreters in Taiwan and Fujian, in terms of how their roles as planners, guides, and followers intersected with Sato's role as an author. Through the support of Sato's literary works and supplementary historical sources, this paper delineates the interaction and dependence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other, thus examining how the other comes to understand a foreign land through interpreters, and how the other creates a personalized interpretation and description.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also describes how the translator creates personal symbolism and meaning through the other's feedback and writings.

Keywords: *Travels in colonized areas*, *Nanpo Kiko (Travels in the South)*, Ushinosuke Mori, Khoo Bun-Kui, Tenn (Hiong-siu)

## 譯者與他者：

### 以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為例

楊 承 淑

#### 一、前言

佐藤春夫（1892-1964）於1963年在〈詩文半世紀〉中回顧其臺閩之旅，曾抒發感言：「彼時之夏，至感幸福」。<sup>1</sup> 而此行最不可或缺的助力，就是提供在地知識與人脈的譯者。包括為他規劃行程並提供臺灣與原住民背景知識及人脈的森丑之助（1877-1926）、一路隨行翻譯的臺中州通譯 A 君（許文葵，1900-1968）、以及伴隨佐藤自高雄抵達廈門的自閩來臺青年鄭君（鄭享綬）。而他們的身影與言行舉動，都在佐藤的臺閩紀行中留下了深刻的投影。

從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作品〈殖民地之旅〉與《南方紀行》可知，譯者可以說是佐藤觀看當地的視窗，而佐藤自己反而成為譯者言論與行動的忠實記錄者。而森丑之助對於佐藤春夫的影響，更可從他在旅遊途中，隨身攜帶並時時翻閱的森丑之助所著《臺灣蕃族誌·第一卷》，可知他對森丑之助所具備的臺灣知識是極為信服的。而佐藤

---

<sup>1</sup> 引自佐藤春夫〈詩文半世紀〉：「全く幸福な一夏であつた。」〔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18卷（京都：臨川書店，2000年），頁108。

對臺書寫的寫實筆法，正如藤井省三所指，作品中相當程度地反映出佐藤春夫對於臺灣受殖民統治的同情。<sup>2</sup>然而，選擇接納一路陪同的譯者所帶來的觀察視角與內涵，並形構為異國書寫的組成與內容；除了歸因於佐藤春夫的對臺同情之外，對於影響作家的譯者，是否也是理應探究的一環？

本文將針對譯者、作者、乃至雙方背後的社會與文化等脈絡，進行多角度的探索，以探究近百年前日臺閩三地曾經擦撞的文化火花。盼藉由此一難得的案例，印證並深化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研究，以歸納分析譯者及其譯事活動在文學與文化事件中的角色功能。

## 二、臺閩紀行的作者與譯者

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裡，作品中直接透露其取材背景與消息來源等線索的陳述可說俯拾皆是。而消息來源中最為多見的，就是旅途中的嚮導兼譯者。為便於參閱，據黃美慧之考察，<sup>3</sup>並依出版日期先後製成以下簡表。

---

<sup>2</sup> [日] 藤井省三：〈植民地台湾へのまなざし——佐藤春夫の「女誠扇綺譚」をめぐって〉，《日本文学》第42卷第1期（1993年1月），頁19-31。

<sup>3</sup> 黃美慧：〈佐藤春夫與臺灣、中國——大正九年的臺福之旅〉，《東海學報》第33卷（1992年6月），頁170-181。

表一：佐藤春夫臺閩紀行中的取材記述

出版日期	作品題目	取材地點	消息來源
1921.03	星（陳三五娘）	漳州	漳州 [ 同行通譯徐朝帆 ] 所言
1921.09	章美雪女士之墓	集美	嚮導兼通譯 - 鄭
1921.11	廈門印象	廈門	嚮導兼通譯 - 鄭
1921.11	漳州	漳州	[ 鄭 ] 及廈門旭羸書院教師徐朝帆、余錫華及軍醫許連城。 <sup>4</sup>
1923.08	鷹爪花	鳳山／尼姑庵	嚮導 - 陳 <sup>5</sup>
1923.10	魔鳥	能高山／霧社	警察翻譯搬行李工人所言
1925.03	霧社	霧社	M 氏（森丑之助）
1925.05	女誠扇綺譚	臺南／安平港	嚮導 - A
1928.01	日章旗下	臺灣南部	從任職官府的日本青年聽聞 <sup>6</sup>
1932.09-11	殖民地之旅	埔里／鹿港／豐原／霧峰	隨行通譯 - A 君
1937.08	社寮島旅情記	基隆／和平島	H 氏（中學同窗，東熙市）
備註：上表右欄「消息來源」[ ] 中所載內容引自佐藤春夫原作，( ) 則為筆者之注記。			

<sup>4</sup> 筆者按：通譯鄭君並未隨行至漳州，但以書面方式提供在地訊息給佐藤。

<sup>5</sup> 筆者按：作品中有兩位陳先生，一是接待佐藤的鳳山米商，另一則是敘述該故事的富人賓客；後者即陳聰楷。據島田謹二〈佐藤春夫氏の「女誠扇綺譚」〉，聽聞陳氏為東熙市出資開業，身分為「前高雄州岡山郡左營庄長」。〔日〕島田謹二：〈佐藤春夫の「女誠扇綺譚」〉，《臺灣時報》1939年9月號，收於〔日〕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1995年），頁353。

<sup>6</sup> 筆者按：從文中敘事者自稱來臺前後經歷及其山地知識等，皆與森丑之助完全吻合。

本節擬針對佐藤春夫的文學特質及其來臺背景，以及對其臺閩書寫提供線索最多，且在作品中受到刻劃最深的三位譯者，以探究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中，作者與譯者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 （一）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是日本現代知名詩人及小說家，和歌山縣新宮市人。父祖兩代皆行醫，母親出身當地望族。據其自撰年譜，<sup>7</sup>12歲時立志成為文學家。1910年當地中學畢業後，即前往東京師事知名小說家生田長江（1882-1936），並加入與謝野寬（1873-1935，與謝野晶子〔1878-1942〕）夫妻主持的新詩社——東京詩社。同年，考入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預科，曾受教於初任該校教職，甫自法國歸來的新派作家永井荷風（1879-1959），但因曠課過多且身心虛弱而於1913年退學。

1919年集結1917-1919年之間的作品，由新潮社刊行定本《田園的憂鬱》是其初試啼聲之作。同年12月，天佑社出版其短篇集《美しき町》（美麗街市）；1921年1月則由春陽堂推出《佐藤春夫選集》。從以上出版社分別為他集結印行作品看來，1920年來臺之前，他已是嶄露頭角的文壇新人了。

1916年佐藤春夫結識受到永井荷風賞識的文壇新銳谷崎潤一郎（1886-1965）並成為好友，1918年獲谷崎推舉而進入文壇。然而數年後卻捲入谷崎的婚姻，愛上了谷崎的妻子石川千代（1896-1982）。1925年他曾將此三角戀情寫成長篇小說《この三つのもの》（這三個人）。1926年谷崎自認與賢妻良母型的千代難以契合，同時佐藤也歷經結婚與離婚的人生低潮，谷崎終與佐藤化解前嫌，於1930年8月寫下休書給千代，讓她帶著女兒與房子和佐藤結婚，三人聯名的離婚

<sup>7</sup> 引自佐藤春夫〈自筆年譜〉。〔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35卷（京都：臨川書店，2001年），頁15。

結婚書成爲轟動一時的「讓妻事件」。

佐藤春夫來到臺灣之前，正是與千代夫人情感糾葛熾烈之際。1920年2月自陳「陷入極度神經衰弱」<sup>8</sup>而返回故鄉新宮。當時，他的中學同學東熙市（Kiichi Higasi，1893-1945）<sup>9</sup>正好爲興建醫院而返鄉調度資金。經老同學一再鼓吹，於是決定臺灣之行。1920年是他寫作空白的一年，而訪臺之後的隔年（1921），一年之內就持續完成了10篇臺閩兩地的遊記與傳說等作品。<sup>10</sup>佐藤春夫也因而成爲殖民時期第一位以臺灣爲題材，並獲得廣大迴響的日本作家。<sup>11</sup>可以說，此行不但是佐藤生命中的第一次境外遠行，對於佐藤春夫的文學與人生而言，此行更是他開拓文學與人生新天地的探索之旅。

<sup>8</sup> 據〈自筆年譜〉。同年自筆「此年，幾無作品」。〔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35卷，頁17。

<sup>9</sup> 東熙市是日本三重縣人，1914年11月畢業於東京齒學專門學校，隨即赴臺於打狗齒療院工作。1918年在打狗開設「東齒科醫院」。日後開業的地點擴及臺南、廈門、麻六甲，亦曾至上海執業。佐藤春夫稱其「酒量佳且豪放磊落，是古道熱腸的好漢，頗具語言天分，工作嚴謹，努力過人」。引自〔日〕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亨綬——〉，《實踐國文學》第84卷（2013年10月），頁50-67；另參〔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12卷，〈觀潮樓附近〉，頁312。又據定本〈年譜・著作年表（明治四三年）〉，1910年9月佐藤就讀慶應大學時，曾於東京本鄉區湯島新花町與東熙市同租一屋。〔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別卷1，頁272。

<sup>10</sup> 《南方紀行》出版於1922年4月20日，故可推知6篇短篇應是1921年底即已完稿。再加上〈黃五娘〉（1921.01）、〈星〉（1921.03）、〈日月潭に遊ぶ記〉（1921.07）、〈蝗の大旅行〉（1921.09）。另詳〈年譜・著作年表（大正十年）〉，〔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別卷1，頁285-286。

<sup>11</sup> 參見〔日〕島田謹二：〈台湾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臺灣時報》1939年7月號，收於〔日〕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頁255。

## (二) 森丑之助

根據楊南郡製作的年譜，<sup>12</sup> 森丑之助生於京都，長於九州，曾在九州長崎市「長崎商業學校」念過一年級（肄業），在校時學過中國南方官話。18歲時以中文通譯身分前往遼東半島服役，同年9月改以陸軍通譯身分申請來臺。森氏來臺後足跡行遍全臺蕃地。三年後已能操排灣、阿眉、布農、泰雅等族蕃語，並受民政部警察本署委託編寫教本陸續出版。<sup>13</sup>

1900年1-9月森氏全程陪同奉派來臺的人類學者鳥居龍藏(1870-1953)，為他擔任「地理嚮導兼土語與蕃語譯員，同時參與調查工作」。<sup>14</sup> 此後，至少16次橫跨中央山脈進行民族學誌記錄、地理調查、服飾圖譜製作、植物採集調查等工作，留下大批田野調查記錄。由於紀錄與圖繪皆備極詳盡，成為對原住民深入而系統化的學術成果。<sup>15</sup>

1902年起，森氏的學術文章、圖譜陸續發表於學術期刊，並散見於報章雜誌共達114篇。<sup>16</sup> 1909年，由臺灣總督府出版《二十萬分之一北蕃圖》。1912年，為三省堂《日本百科大辭典》撰寫第6卷「臺灣蕃族」項，共7500字、照片16張。1915年，出版《臺灣蕃族圖譜》第1、2卷。1917年出版《臺灣蕃族志》第1卷（泰雅族篇）。

森丑之助在臺灣30年，從完全不諳蕃語，到成為能操持數種蕃

<sup>12</sup> [日]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注：《生蕃行腳》（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森丑之助年譜〉，頁601-638。

<sup>13</sup> 1899年森丑之助為民政部警察本署編寫《排灣蕃語集》與《阿眉蕃語集》，翌年完成《布農蕃語集》。前兩書於1909年由蕃務本署以小冊子形式發行，現存蕃語集多以其著作為底本。

<sup>14</sup> 森丑之助《生蕃行腳》原載《臺灣時報》大正十三年（1924）4-11月。中譯文引自[日]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注：《生蕃行腳》，頁180。

<sup>15</sup> 引自[日]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注：《生蕃行腳》，頁51。

<sup>16</sup> 114篇的統計是楊南郡考察所得，但未包含已成書的文章及對他的報導。[日]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注：《生蕃行腳》，頁26。森氏著作與論文目錄詳見[日]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注：《生蕃行腳》，頁639-662。

語的通譯，進而編寫蕃語教材，持續發表著作。再透過長期投入田野工作，深入蕃地取得精確的一手資料，終成「臺灣生蕃研究第一人」。<sup>17</sup>

然而，1923年日本遭逢關東大地震，原訂各出版20卷的《臺灣蕃族圖譜》與《臺灣蕃族志》原稿與資料全數化為灰燼。其後，為推動「蕃人樂園」計畫受挫而抑鬱失落。1926年7月3日，登上基隆駛往神戶的「笠戶丸」擬歸門司，卻於翌日自船上投海自盡，時年49歲。接獲森氏之女電文通知的佐藤春夫於1926年8月10日致父親函中透露其心情：「思及多年交誼，悲嘆至極！」<sup>18</sup>

1920年夏，森丑之助雖未一路隨行，但對佐藤春夫的臺閩之旅影響至深。<sup>19</sup>據佐藤春夫1936年〈かの一夏の記〉的回顧，他從7月6日與東熙市抵達基隆港後，就直奔森氏任職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請教如何規劃此行的日程。森丑之助在總督府內雖未居要職卻頗具份量，故藉其斡旋之力，佐藤一路受到彷彿總督府貴賓的禮遇，且得以遍遊島上所有名勝古蹟。<sup>20</sup>

有關兩人的私誼，根據兩者的對照年譜可知，佐藤春夫離臺前曾應邀在森丑之助家中盤桓近半月。<sup>21</sup>又據《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19

<sup>17</sup> 引自1935年遺孀森龍子為他寫下的300字略傳。〔日〕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注：《生蕃行腳》，頁636-637。

<sup>18</sup> 據佐藤春夫1926年8月10日致父親書簡，參見〈佐藤春夫が描いた森丑之助〉。〔日〕笠原政治著，〔日〕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編：《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和歌山〔新宮市〕：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2003年），頁29；又見〔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36卷，頁85。

<sup>19</sup> 森氏曾於1920年7月17日寫信給佐藤，提到「因近日腳部神經持續疼痛致無法隨行，深感遺憾」。引自〔日〕森丑之助著，〔日〕牛山百合子翻刻：《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頁5。

<sup>20</sup> 又據佐藤春夫〈詩文半世紀〉中提到森氏深受蕃族敬重，且總督府裡有熟人，故訪臺行程悉由森氏安排並委其上司代為疏通。〔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18卷，頁108。

<sup>21</sup> 參〈佐藤春夫・森丑之助年譜〉1920年森丑之助欄，〔日〕森丑之助著，〔日〕牛山百合子翻刻：《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頁50。

卷及《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1926年8月10日致其父函中提及1926年5月森丑之助曾往佐藤春夫東京自宅拜訪，致使佐藤得知森氏死訊時尤感錯愕與悲痛。<sup>22</sup>此外，據佐藤春夫1936年〈殘雪日記〉中的敘述，森氏逝後其女偕夫婿為整理森氏遺稿而數度前往佐藤春夫家拜訪。文中稱森氏為「手無寸鐵，卻在蕃地來去自如，是蕃人心目中的日本頭目」，自己「佩服丙牛先生為人，故樂聞其言」。<sup>23</sup>

從以上出自佐藤春夫的文章與私函，可知森丑之助的人格特質及兩人之間的信賴關係。若能進一步由佐藤的作品探索，更可理解森氏在佐藤心目中的形象與作用。

### （三）許文葵

根據臺灣新民報社編輯的《臺灣人士鑑》，「許媽葵（又稱文葵、鵝魂）明治三十三年1月9日生於鹿港。少修漢學，後入臺中中學校（即臺中一中），並為首屆畢業生。畢業後即任臺中州書記及通譯」。文中且稱他「頭腦明晰」。<sup>24</sup>

許氏於1920年佐藤春夫訪臺時擔任隨行翻譯，因而被寫入1932年出版的〈殖民地之旅〉，成為其終生為人樂道的亮麗事蹟。據曾經親訪許文葵的池田敏雄（1916-1981），在〈鹿港遊記〉與〈亡友記〉中的敘述，<sup>25</sup>許氏即〈殖民地之旅〉中的「臺灣通譯A君」。而據河

<sup>22</sup> 參見「イロ・ロオマンのこと」，〔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36卷，頁85；另詳〔日〕笠原政治：〈佐藤春夫が描いた森丑之助〉，收於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編：《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頁29。

<sup>23</sup> 〔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21卷，〈殘雪日記〉，頁153-156。又，「丙牛」為森氏雅號。

<sup>24</sup> 參臺灣新民報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許媽葵」條目，頁41。該書是臺灣新民報為日刊發行一週年而編，「發刊之辭」指出其判別標準是針對具信望之重要人士，不論其階級、貧富，以對臺灣社會意義為指標，經嚴選後收錄之。

<sup>25</sup> 〔日〕池田敏雄：〈鹿港遊記〉，《臺灣地方行政》1942年8月號，頁98；〔日〕池田敏雄：〈亡友記〉，收於吳新榮先生遺著，張良澤編：《震瀛追思

原功從鹿港戶政事務所調查得知，<sup>26</sup>許氏歿於1968年11月。從以上日臺學者專家的延續性探索與記載可知，許文葵在佐藤春夫的研究系譜中，始終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sup>27</sup>

根據陳艷紅的調查，<sup>28</sup>許文葵1917年臺中中學畢業後即進入臺中州廳擔任雇員，並兼州知事通譯。由於雅好詩文，1921年起持續加入「大治吟社」等詩社。1933年更創立「淬勵吟社」。1942年曾經營當舖「鹿門莊」，但亦充作文人沙龍集會之用。1945年任臺中一中國文教師，但因僅諳日臺語致不符所需，1955年即被迫退休。<sup>29</sup>其鹿港同鄉洪炎秋（1899-1980）〈佐藤春夫筆下的鹿港〉、<sup>30</sup>林莊生《懷樹又懷人》第9章〈許文葵先生〉裡，<sup>31</sup>都提到許氏晚年生活拮据的景象。

許文葵於弱冠之齡即受州知事指派為佐藤春夫擔任陪同秘書兼通譯，可見胸有點墨。且1934年即列名於《臺灣人士鑑》，可見頗受

---

錄》（佳里：瑠琅山房，1997年），頁125。

<sup>26</sup> [日] 河原功：〈佐藤春夫「植民地の旅」の真相〉，收於河原功：《台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東京：研文出版〔山本書店出版部〕，1997年），頁23。

<sup>27</sup> 關於許文葵研究的重要前人文獻及許氏生平與作中角色等，詳見邱若山：〈佐藤春夫「植民地の旅」をめぐって〉，《日本学と台湾学》創刊號（2002年7月），頁129-149。

<sup>28</sup> 陳艷紅：〈日本文化人の目に映った鹿港の半世紀（1920-1976）〉，2005年9月10日臺灣大學舉辦之「天理臺灣學會第15回研究大會」，《臺灣大會紀念演講及研究發表論文報告集》B6-3場，未出版，無頁碼。

<sup>29</sup> 據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追憶，由於許文葵只能以臺語授課，在學校地位逐年下降。由訓導主任降為勞動服務組組長，後再降至初中班導師；授課也從國文，改為公民。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頁161-170。

<sup>30</sup> 洪炎秋在〈植民地の旅〉中也受到記載；當時恰逢許文葵與佐藤春夫在鹿港街上與他不期而遇，乃請洪邀其父親——著名詩人洪棄生與佐藤會面卻未獲首肯。見洪炎秋：〈佐藤春夫筆下的鹿港〉，收於蘇薊雨、葉榮鐘、洪炎秋：《三友集》（臺中：中央書局，1979年），頁294-301。

<sup>31</sup>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頁162。

同時代人器重。洪炎秋在〈佐藤春夫筆下的鹿港〉的附注裡提到，<sup>32</sup>許文葵「年輕時候，才氣煥發，能說善道，假期常從先父學詩文，好跟日本人抬槓，為本省人吐氣」。由此可知，許氏頗具才情、雅好詩文，且個性方正。

根據陳艷紅的研究，許文葵除了1920年伴隨佐藤春夫同遊之外，其後還擔任過不少日本文化人士的通譯兼嚮導。如畫家立石鐵臣（1905-1980）、法政學者中村哲（1912-2003）、民俗研究者池田敏雄等。<sup>33</sup>由此可知，許文葵是作家、畫家、學者、民俗研究者等想要尋訪的在地文化人。尤其，長期居住臺北的民俗研究者池田敏雄更是數度造訪，<sup>34</sup>可見許氏的文才及在地知識與見解等頗受學者專家信賴。

#### （四）鄭（享綬）

根據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援引廈門地方史料與日本外務省史料，以及後續對於東熙市家族的口述訪談等綿密的考察，<sup>35</sup>終於揭露了佐藤春夫臺閩紀行中的謎樣人物——「鄭」（鄭享綬）的姓名與經歷。原來，這位出身廈門的鄭君曾在鼓浪嶼的尋源中學就讀，和《南方紀行》中提及的養元小學校長周坤元（生卒年不詳）有同窗之誼。閩地遊蹤所到之處，大都與鄭君的在地人脈密切相關。可以說，沒有鄭享綬這號人

<sup>32</sup> 洪炎秋：〈佐藤春夫筆下的鹿港〉，收於蘇薊雨、葉榮鐘、洪炎秋：《三友集》，頁301。

<sup>33</sup> 參見〔日〕池田敏雄：〈鹿港遊記〉，頁92；楊承淑：〈臺灣日治時期的譯者群像〉，收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編：《翻譯史研究》第2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78-216。

<sup>34</sup> 據〈亡友記〉，數度造訪鹿港的池田敏雄，於許文葵逝世後回到許氏當年開設的「鹿門居」時，但見舊址已成廢墟，門前竟成麵攤與水果攤販聚集之處，感懷至深。〔日〕池田敏雄：〈亡友記〉，收於吳新榮先生遺著，張良澤編：《震瀛追思錄》，頁126。

<sup>35</sup> 參見〔日〕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台湾で居候になるーインタビュー・東熙市一家の記憶から——〉，《実践女子大学文芸資料研究所 年報》第33号（2014年3月），頁278-301。

物，佐藤春夫大概也不會到該處遊歷了。

其實，不僅佐藤春夫到福建需要鄭君的協助，根據河野龍也的研究，<sup>36</sup>就連東熙市也不例外。1923年8月東氏前往位於鼓浪嶼的廈門博愛會醫院赴任，擔任該院新設的齒科副醫長。東氏時年33歲，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技手身分赴閩。河野根據《大正拾參年度廈門博愛會事業成績報告書》職員錄發現鄭享綬以「齒科雇」的身分，<sup>37</sup>於東熙市就任後三個月——1923年11月，再次成為東熙市的手下。又據河野編製的「東熙市年譜」，鄭君的就職正是出於東氏的主動安排。<sup>38</sup>

此後，東氏在廈門博愛會醫院持續工作6年。1930年1月至1932年底，東氏在鼓浪嶼東部的洋墓口開業3年。但由於排日運動日熾，東氏離閩前往香港謀求發展。而鄭享綬也早在1928年辭職，1931年於思明南路經營「鄭享綬牙科」，1932年遷往廈門市中心的中山路14號。河野的考察大抵追蹤到此，其後的行蹤則未能明朗。<sup>39</sup>

對於《南方紀行》中的鄭君，<sup>40</sup>佐藤僅以「鄭」稱之，〈廈門印象〉裡的記述是：「為我帶路並同行的人，是在這個港口——打狗開設齒科診所的中學時代舊友H君的學徒鄭。這年輕人隨其姊夫夫妻

<sup>36</sup> [日] 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實踐國文學》第84卷（2013年10月），頁55。

<sup>37</sup> 轉引自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注16，「大正拾參年度廈門博愛會事業成績報告書」B05015217700（第221画像目），補助（病院、学会、民団、学校）／補助關係雜件第二卷（H.4.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 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頁65。

<sup>38</sup> 河野龍也製作之「東熙市年譜」，詳見[日] 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台湾で居候になる—インタビュー・東熙市一家の記憶から—〉，頁282。

<sup>39</sup> 據河野龍也文中披露的鼓浪嶼東齒科醫院治療室中的一張照片，以及東熙市長女照子的回憶，照片裡站在中間的中國男子後來在廈門開業。看來，此人很可能就是鄭享綬。[日] 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台湾で居候になる—インタビュー・東熙市一家の記憶から—〉，頁292。

<sup>40</sup> 《南方紀行》中的〈鷺江月明〉裡，佐藤曾一度直呼過「鄭君」，故擬依此援引之以利行文。

生活於打狗，是廈門出生且在廈門中學畢業的男子。」此外，該文也提到當時「鄭」在廈門並無親人，年約24-25歲（依周坤元樣貌推算）。

然而，河野根據丘廬兢的自述，<sup>41</sup>發現鄭享綬與周坤元曾於1916年2月參與學生志願軍並加入「廈門起義」計畫，密謀在廈門進行反政府行動。學生軍的任務是以癱瘓電話公司、電燈公司、及中國銀行等為目標。可見，鄭周兩人都是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願為社會與政治理想冒險犯難。然而，當年的起義計畫卻因事機不密，只好宣布緩期，以致功敗垂成。

從《南方紀行》裡鄭君到廈門的第一天，就立即前往鼓浪嶼見這位擔任養元小學校長的老同學，而周（佐藤春夫僅稱他為「周」）也在隔天，特地從鼓浪嶼到廈門探訪佐藤。可見，鄭周兩人不僅關係密切，且兩者見面之前，似乎都有些敵人疑竇的「情節」出現。例如，鄭君一到廈門就神秘失蹤，以致引起佐藤的無端臆測。又，鄭君既然和周談妥要帶佐藤借住學校，周何以要先來跟佐藤見面？但從兩人曾經加入志願軍的身分背景，以及當年革命黨人以鼓浪嶼為集結中心的地緣意義來看，<sup>42</sup>前述行動的合理解釋應是兩人為確保自身安全而做的防禦措施。

此外，《南方紀行》的各篇記述中，鄭君對於當地的回憶，正好

<sup>41</sup> 丘廬兢：〈閩南倒袁運動記〉，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廈門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廈門文史資料》第9輯（廈門：鷺江出版社，1985年），頁1-25。據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指出，原件姓名雖載為「鄭享綬」，但該筆資料與周坤元等尋源（原件印為「原」）中學學生共六名同列其中，指該批學生曾參與該次革命。故姓名與校名之誤，可能出於抄錄或誤植之故。〔日〕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頁63-67。

<sup>42</sup> 丘廬兢〈閩南倒袁運動記〉指出，鼓浪嶼為萬國公地，中國官廳不得在此逮捕和引渡黨人，故「鼓浪嶼為革命黨人集結中心，成為半公開的秘密」。丘廬兢：〈閩南倒袁運動記〉，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廈門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廈門文史資料》第9輯，頁22。

都落在四五年前。亦即，當年鄭周兩人投入起義行動的時候。例如〈章美雪女士之墓〉，鄭君回憶友人未婚妻章美雪落水身亡的時間說道：「大概有四五年了」；而經佐藤比對墓碑上的卒年，發現身故時正是五年前的夏天。又如〈集美學校〉，文中對於集美學校的介紹是：「這個小漁村從四五年前，突然在廈門地方成了出名的地點。」此外〈鷺江の月明〉裡，兩人聯袂訪問林季商（1878-1925，號祖密）宅邸時，鄭君提到「大約四年前，就在這宅邸旁的行道樹裡發生過命案。」從以上三例看來，鄭君對於廈門的記憶似乎多停留在四五年前，致使佐藤文中也未曾提到近兩三年發生的事情。依此或可推斷鄭享綬因為反袁（世凱）而投身革命活動，以致四年半前跑去臺灣投靠姊夫「避風頭」，<sup>43</sup>1920年夏天陪同佐藤春夫的旅程，很可能是他四年多（1916年2月廈門起義失敗）以來的首度歸鄉之旅。若是如此，也就可以合理解釋鄭君何以一下船就丟下佐藤不管，甚至第一晚就夜不歸營地奔向過去最熟知的鼓浪嶼了。

然而，不同於森丑之助與許文葵受到的學界關注，在河野龍也之前，幾乎未有任何前人文獻留意過「鄭」的生平與事蹟。迄今對於鄭君的描述主要集中於《南方紀行》裡的記述；包括他的廈門出身背景、使用語言、旅途中的態度等。不過，對於佐藤春夫臺閩兩地的書寫，與譯者及當地人脈與情勢的影響關係，還是頗受學者注目的課題。從佐藤春夫的角度，歸納他對譯者的感受與書寫角度的研究如下：

首先，黃美慧在〈佐藤春夫與臺灣、中國——大正九年的臺福之旅〉中，<sup>44</sup>指陳這位鄭君的行事作風：「隔天傍晚，鄭總算回到了旅館，但他只顧著跟朋友聯絡而不太理會佐藤春夫。……完全漠視佐藤春夫的存在，盡用自己的語言聊他們自己的事。」同時也認為：「嚮

<sup>43</sup> 《南方紀行》中〈廈門の印象〉裡，佐藤春夫指鄭君當時投靠姊夫夫妻在打狗生活。

<sup>44</sup> 黃美慧：〈佐藤春夫與臺灣、中國——大正九年的臺福之旅〉，頁177-180。

導不親切」，以及福建反日意識強烈，同行者力促佐藤須說英語等，導致他為語言不通、譯者不佳、人脈匱乏、社會不友善而吃了不少苦頭。

此外，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又指佐藤的臺閩作品中，<sup>45</sup>「出現在中國的『鄭』有許多負面書寫，臺灣場景下的『鄭』則投以溫情的眼光」。該文推論：「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因而讓佐藤對『鄭』這位人物有些敏感？」

其實，以上每位譯者在作品中的人物角色，都在佐藤春夫筆下刻劃得有血有肉讓人印象鮮明，也成為作品中最具貫穿力量的人物。透過這趟臺閩之旅的書寫，佐藤深入地描繪每一位譯者的個性與形象，並企圖讓每位譯者帶來的故事與當地歷史與社會連結，形成作品的構圖及敘事脈絡。如今重新審視此一近百年前的臺閩敘事，因其真實而有了格外厚重的歷史感。究竟，當年參與創作過程的譯者，曾為作者帶來什麼樣的視角與體驗？或者，譯者又為作者帶來了什麼樣的限制與感受？

從此一觀點思考，臺閩的正負面經驗在佐藤異國文學的形塑過程中，似乎各有其深刻的意義。而放眼異國行旅的文學創作，出於誤解與偏見所激發的「再生產」者不在少數；來自正解與同情所醞釀的創作亦不無偏移。盼以作家與譯者力量的相互作用為經緯，藉由佐藤春夫對於臺閩兩地人事的精細書寫，探索受到語言與環境限制的異國旅遊作家，進行再生產時的共同課題。

### 三、臺閩書寫中的譯者角色

綜觀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系列作品，作者採取忠實呈現當地人文與現況的原則與筆法，可說是十分突出的特質，甚至被稱為「博物館

---

<sup>45</sup> 參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7月），頁130。

學的觀看」<sup>46</sup>。而譯者在作品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其中促成並形成敘事的關鍵人物。作品中的譯者主要有以下三類作用與意義：

第一類：如森丑之助對於作品形成之前的路途規劃，並提供主題內容等角色功能。而鄭亨綬也在佐藤春夫赴漳州之前，為他提供了書面行程規劃。

第二類：如許文葵與鄭君在作品裡以旅途嚮導的身分成為作中人物；兩者都直接在作品中陳述其在地知識與觀點，且都貢獻其在地人脈並成為作品中的搭配人物與主題內容（如〈殖民地之旅〉、〈章美雪女士之墓〉）等。

第三類：譯者隱身於作品背後，反由作者充當譯者「代言人」角色，採取第一人稱敘事的筆法。如，森丑之助隱身於〈日章旗之下〉。或由譯者提供題材內容，而作者加以概述。如，鄭君在〈漳州〉中同時扮演隱身與顯身的角色功能。

### （一）促成作品的譯者

有關佐藤春夫與森丑之助的研究，主要有笠原政治的〈佐藤春夫が描いた森丑之助〉<sup>47</sup>（佐藤春夫筆下的森丑之助）以及收入這篇文章的《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這本紀念集收入佐藤家藏10封與臺閩遊歷相關的書簡，並交由其出生地「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出版，史料意義尤其重大。

這本紀念集的刊行序言裡，有段館長疋田眞臣引述佐藤春夫1936年〈かの一夏の記〉（彼夏之記）的記載：

<sup>46</sup> 參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第3章，〈帝域與異域：1920年代佐藤春夫的南方體驗〉引言，頁91。

<sup>47</sup> [日] 笠原政治：〈佐藤春夫が描いた森丑之助〉，收於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編：《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頁24-32。

停留於打狗期間，臺北的丙牛先生再三惠予信函，要我於最短期間內務必遍行臺灣值得一遊之處，其言懇切，溢於言表。彼時全心盡力行走，先生來函亦保存至今。遊歷順次與日程函中皆明確記載，此乃力求遵行森先生之規劃，未予多加更動之故也。<sup>48</sup>

由這段出自佐藤春夫的筆下證言，且受到佐藤春夫紀念館館長的慎重援引，可知佐藤春夫雖曾請教過森氏規劃旅遊，但森丑之助也是懇切盼望能藉佐藤之筆，對日本本土傳遞臺灣的情況。

此外，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中，依其書寫題材可分以下數類：

1. 民間傳說：描述媽祖傳說的〈社寮島旅情記〉、〈天上聖母〉以及從漳州醫院聽聞的陳三五娘故事〈星〉。
2. 地方逸聞：以安平港見聞加上 A 君敘述的林家故事——〈女誠扇綺譚〉及記述鼓浪嶼鄭君友人及其未婚妻故事與墓地景象——〈章美雪女士之墓〉。
3. 文化巡訪：第一人稱自敘見聞的〈殖民地之旅〉及遊歷福建所見所聞的〈廈門印象〉、〈集美學校〉、〈漳州〉等作品。
4. 原住民敘事：〈魔鳥〉、〈霧社〉、〈旅人〉、〈日月潭遊記〉等。

顯然，臺閩兩地紀行中最顯著的主題差異在於「原住民故事」。根據森丑之助為佐藤春夫擬定的日程可知，從9月9日抵奮起湖開始，直到9月18日離開埔里社為止，其行蹤涵蓋阿里山、日月潭、埔里、霧社、能高山等都屬蕃地範圍。然而相對於短短的九天期間，蕃地相關的作品數量與份量是十分可觀的。計有：〈日月潭遊記〉、〈鷹爪花〉、〈魔鳥〉、〈旅人〉、〈霧社〉、〈日章旗下〉、〈蕃童〉、〈生蕃

<sup>48</sup> 〈かの一夏の記〉初出〔日〕佐藤春夫：《霧社》（東京：昭森社，1936年），引自〔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21卷，頁224-228。

之子〉（後改名〈排灣之子〉）、〈阿里山木輓歌〉等。若非森丑之助的引介，對於初遊臺灣的佐藤春夫而言，以原住民地區與風物為對象的書寫非但難以醞釀成篇，恐怕也是短時間內難以企及的題材吧。

## （二）作中人物的譯者

〈殖民地之旅〉中扮演嚮導與秘書角色的 A 君，在作品中是位性格突出、角色鮮活的人物。作中對於他的性格描述包括：直言批評當局將「胡蘆屯」的地名改為「豐原」，恐將導致當地民眾產生受征服的挫敗感。又，對於那些要求林獻堂（1881-1956）排解糾紛的鄉民，願意聽從林氏的指示時表示：「老實的鄉下地方還真好」（さすがに平和な田舎らしくていい），<sup>49</sup>讓佐藤覺得此話顯得多餘，因而記上一筆。顯然，佐藤眼中的 A 君有著好發議論的性格，因而出現不少逾越譯者或嚮導角色的行為舉動。

尤其，作品中的 A 君不完全是聽命於佐藤春夫的跟隨者，有時他也是某些行動的引發者。例如，當佐藤有意訪問鹿港詩人洪棄生（1867-1930）<sup>50</sup>未果後，A 君隔日將自藏的洪氏詩集<sup>51</sup>贈予佐藤。該詩集果然受到佐藤高度評價與珍視，並引述成為《南方紀行》的卷首詩，<sup>52</sup>故其份量可見一斑。而另一方面，作品中的佐藤春夫有時卻又成為不得不配合 A 君的訪客。例如，在去豐原的車上，佐藤本想細細玩味洪棄生詩集或是仔細瀏覽車外的沃土風光，但因 A 君的滔滔

<sup>49</sup> 詳見〔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 27 卷，〈殖民地之旅〉，頁 93。

<sup>50</sup> 洪棄生原名洪攀桂，字月樵。因臺灣割讓而改名棄生，埋首讀書作詩，不問世事。

<sup>51</sup> 洪棄生《寄鶴齋詩贊》1917 年付梓，是 60 卷詩文全集的精選集，共 4 冊。參蘇蕪雨、葉榮鐘、洪炎秋：《三友集》，頁 309-313。佐藤於文中提到，此書製作質樸、內容珍奇，深受「魅惑」，日後長期珍藏於書齋列於座右。

<sup>52</sup> 《南方紀行》卷首詩抄錄如右：「羨君兩袖新詩本，湖色濤生又酒痕。洪棄生。」

宏論，最後只能作罷。不過，大體上佐藤還是接受了 A 君的看法，並精細生動地寫進作品。

至於，閩地旅途中的鄭君，在涵蓋 6 篇文章的《南方紀行》裡，<sup>53</sup> 大都扮演穿針引線的重要角色。無論佐藤所到之處、所見人物，大致不出鄭君的交友圈。例如，前往鼓浪嶼的養元小學並住宿職員室，以及前往漳州遇見的中學英語教師朱雨亭（生卒年不詳），都是透過鄭享綬的中學同學周坤元的人脈。又如〈集美學校〉裡遇見的校醫兼「支那文學講師的詩人」——陳鏡衡（生卒年不詳），曾任尋源中學教師；據河野龍也的考察，<sup>54</sup> 應該是教過鄭君的人物。此外，透過鄭君在集美學校任教的幾位老同學，佐藤得以恣意地在該校走動及用餐等。

而另一方面，也有些看似佐藤在臺灣的人脈所促成的遊歷。例如，透過新高銀行廈門支店長林木土（1893-?）為佐藤設宴，結識漳州軍參謀長林季商長子林正熊（1899-1993）。經鄭君尾隨林正熊夜遊歸來後，力薦並安排佐藤與林正熊等人泛舟鷺江，是夜數度尋訪歌妓十分盡興。因此，鷺江夜遊的體驗，若非鄭君的積極推薦與安排，恐怕未必能夠實現。

其實，林季商出身臺中霧峰林家，臺灣日治後即返閩定居。他從 1915 年加入孫中山先生（1866-1925）號召的「中華革命黨」，力反袁世凱（1859-1916）之篡國殃民。1916 年 4 月「閩南護國軍」建立後，更多次在其鼓浪嶼寓所召集漳泉革命志士聚會，商討如何剷除軍閥在閩勢力，並捐資數十萬元以充軍餉。<sup>55</sup> 從其背景經歷看來，與鄭

<sup>53</sup> 1922 年由東京新潮社發行的《南方紀行：廈門採訪冊》包含六篇作品：〈廈門的印象〉、〈集美學校〉、〈漳州〉、〈章美雪女士之墓〉、〈鷺江の月明〉、〈朱雨亭のこと、その他〉。

<sup>54</sup> [日] 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頁 50-67。

<sup>55</sup> 參何丙仲：〈獻身閩南民主革命的臺胞林祖密傳略〉，收於鼓浪嶼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系列叢書編委會編：《鼓浪嶼文史資料》上冊（廈門，鼓浪嶼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系列叢書編委會，2010 年），頁 67。

享綬加入1916年2月「廈門起義」的革命背景對照起來，兩者在時間與事件的重疊上，讓人不禁產生瓜葛牽連的隱約聯想。

而另一方面，若就文本意義而言，假使臺閩書寫中抽掉了A君與鄭君的話，大概根本難以成篇。換言之，佐藤春夫的寫作對象針對的是臺灣或閩地的人與事，而他的書寫內涵正是透過譯者的在地人脈與在地知識而形塑的。文中的譯者一方面成為佐藤觀看當地的主要窗口，而佐藤春夫身為觀看者所持的感受與論述，與作中的譯者彷彿鏡中人似地，彼此形成鮮明的身影對照。

### （三）作中隱身的譯者

1928年刊行的〈日章旗之下〉，<sup>56</sup>佐藤春夫化身為記者與文人，敘事者則為「任職政府機構的日本人」。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對自幼浪跡海外的夫妻——松原，他們將非洲帶來的花種帶到日本國旗下的臺灣，但後來除了牽牛花之外，無一育種成功。不過，來臺不到一年夫妻倆就在蕃地受到殺害。文中的敘事者細述山胞出草的知識，並依此推斷該事件並非蕃族所為。

從以上種種跡象看來，佐藤春夫雖未直接點名森氏，但從故事敘述者自稱來臺前擔任陸軍南京官話通譯官，以及與蕃地頭目產生交情的由來，乃至東海岸地方官對土地利益不能放手讓予松原等暗批之詞，從佐藤春夫可能的消息來源推想，與森氏的關聯性可說不做第二人想。尤其，對照森氏1913年披露於《東洋時報》的〈生蕃の首狩に対する感念と其慣習〉<sup>57</sup>（生蕃獵首觀念及其慣習）等數十篇研究調查成果可知，當時任職於殖民政府機構的日本人，對於生蕃習俗文化能有如此透徹的知識洞見，大概無人能出森氏之右。

<sup>56</sup> [日] 佐藤春夫：《霧社》（東京：昭森社，1936年），〈日章旗の下に〉，頁3-13。

<sup>57</sup> [日] 森丑之助：〈生蕃の首狩に対する感念と其慣習〉，收於[日] 越川良厚編：《東洋時報》第183號（東京：東洋協會，1913年），頁25-35。

據森丑之助的研究，<sup>58</sup> 生蕃的獵首是拿自己性命賭上的信仰，若非出於上天允許的正氣，自己必亡於此。故獵首前必占卜問神、齋戒沐浴，獲上天應允後始結隊出發，此乃維持其生蕃魂的社會行動。而獵得的首級必祭於頭骨架上，供以酒、肉、粟餅、蕃薯，並永遠迎入其社。因此，生蕃絕不任意殺害第三者，亦不會凌辱死者或竊取財物。由於〈日章旗之下〉的松原夫妻死狀甚慘且身首異處，行李箱亦遭人撬開。眾人皆指山胞所為，但敘述者一見現場景況，即指生蕃取得首級必用以祭祀，棄置路旁絕非生蕃之行事。此一深入精關的見解，若非森氏的研究結論支撐，佐藤何以有此能耐並寫入作品！

此外，從佐藤春夫的訪臺作品內容與敘事觀點看來，森氏的影子更是呼之欲出。例如，1923年出版的〈魔鳥〉即是參照《臺灣蕃族志》而寫成的傳說。又如1925年的〈霧社〉裡，佐藤不但將他化名為M氏，甚至直言旅途中隨身攜帶《臺灣蕃族志》，並指明文中的M氏即是森丑之助（文中稱「森丙牛」）。<sup>59</sup>

綜觀臺閩兩地的書寫，可知佐藤對於遊歷的路線、旅次的經緯、與譯者及在地人士的互動等，大都以鉅細靡遺的方式記述其親身見聞。然而，沿著敘事的梗概，佐藤春夫自行注入最多的書寫，就是對於自然風貌的細膩描摹，以及對於當地歷史人文的精細記述。例如，《南方紀行》中的〈鷺江月明〉與〈漳州〉。書寫鷺江夜景固然可出自佐藤自身的細微觀察與心領神會，但陳炯明（1878-1933）的「援閩護法粵軍」自1918-1920年間在漳州的治理事蹟乃至其行事為人等，恐非佐藤專精所在。尤其，從佐藤旅行閩地之際，對於福建在地情況了解有限的種種敘事看來，顯然如此精關的時局情勢以及漳州的陳炯

<sup>58</sup> [日] 森丑之助：〈生蕃の首狩に対する感念と其慣習〉，頁25-35。

<sup>59</sup> 磯村美保子指出，森丑之助為本名，筆名則依其需要有不同。計有：森丙牛、はに牛、熄火山人、曾遊生、劍潭子等。[日] 磯村美保子：〈佐藤春夫「魔鳥」と台湾原住民——再周辺化されたものたち〉，收於金城学院大学編：《金城学院大学論集・人文科学編》（名古屋：金城学院大学，2006年），頁55-66。

明、安海的許督蓮<sup>60</sup>（許卓然，1885-1930）等人物事蹟的描述，應該背後另有高人指點方為合理。

而曾經投身反袁學生志願軍的鄭君，對於前述事蹟有一定程度的關注與了解，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因此，提前返臺而致無法陪同佐藤前往的鄭君，文中提到鄭君已將對漳州所知之事記載在佐藤的筆記裡。結果，鄭君的筆記內容比起實際帶路的兩位臺籍日本小學老師——徐朝帆、余錦華都要高明許多。由此可見，鄭君雖未現身，但在〈漳州〉裡的份量卻不宜輕忽。

這篇《南方紀行》中篇幅頗長的遊記裡，<sup>61</sup> 陳炯明政績與軼事的敘事就佔去了四分之一篇幅。可見佐藤對於陳炯明的興趣極高，如〈漳州〉自敘：「今日不去（漳州），恐終生無緣，故不遲疑，匆匆起床，匆匆出門。——抵達廈門以來，處處聽聞漳州之事，乃思見識陳炯明在漳州有何行事作為。」開始書寫陳炯明其人其事時，佐藤不禁又一次提到：「抵達廈門以來，雖無意聽聞，但卻處處有人傳述於我，故綜合傳聞敘之。」

其實，前往漳州對於佐藤而言，可是大費周章的安排。首先，他必須克服鄭君無法陪同的語言障礙。其次，為此行程需延後三日，且需繞道基隆返回高雄。然而，文中稱：「即便如此，還是想看看漳州，而且，也有人勸我該去看看。」接著又稱，與鄭別後「這四五天裡，前往這個陌生的異鄉路上，我就得孤伶伶地被扔了下來」。可見，漳州之行絕非興之所至的漫遊，而應是有明確目的探訪之旅。

〈漳州〉裡的鄭君，雖然未曾現身於漳州，但透過佐藤春夫的敘事，間接成為提供〈漳州〉作品內容隱身的發言者，而作者則成為作

<sup>60</sup> 據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考察，指同為在廈門反袁運動領袖之一，時任中華革命黨福建支部核心幹部的許卓然即為《南方紀行》中有德之士許督蓮的原型。〔日〕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頁51。

<sup>61</sup> 〈漳州〉的篇幅是〈廈門的印象〉、〈集美學校〉、〈鷺江の月明〉的兩倍。

品中顯身的行動者。而〈日章旗之下〉裡，森丑之助的姓名雖未見諸於作品。但他對於當局的批判以及蕃地知識與判斷等，卻由作者借作中人之口而直率地呈現。

透過佐藤春夫之筆，無論前往閩地中原本陌生的漳州，並探索陳炯明在當地的文治武功，以形成〈漳州〉的主題敘事。或如森丑之助對於臺灣原住民的理解與見解，最終形成佐藤臺灣書寫的內涵與意識，並成為其蕃地文學的血脈。似乎作者與譯者之間，建構起互為依存的共同創作。即使在地敘事者隱身於作品背後時，從作品的主題性（以蕃地或臺閩傳說為主體架構）、人物的主體性（以當地人物為作品主體）、敘事的主觀性（以當地人觀點陳述）等，仍足以洞察在地者發出的強烈心聲，並體現在地生活者的視角與視域。

#### 四、他者與譯者

透過當地譯者所提供的在地人脈與在地知識，佐藤春夫以職業作家的思維及其敏銳覺察，在行旅中一路進行有計畫的採集及縝密的記錄，<sup>62</sup> 並據其題材與行旅過程加以剪裁修整。本節所要探討的重點就是哪些是佐藤將在地生活的譯者抽離的部分，而哪些又是作者加以作品化的成分。

##### （一）異國的詮釋者與在地的生活者

〈殖民地之旅〉的遊歷雖發生於1920年，而文章的問世卻是1932年。到了1936年版的《霧社》書中收入〈殖民地之旅〉時，作者在文後還另外加上了兩行「作者附記」，表示「本文虛實參半，盼勿累

---

<sup>62</sup> 根據〈集美學校〉中的記述，佐藤一路上筆記不離身地記錄之外，前往福建時甚至要求鄭君為他確認記載的正確性，以避免日期或事件的記載有所混淆。

及作中人」。<sup>63</sup> 相隔達 12 年的問世且是該系列作品最後一篇的最後一段，佐藤終於在 16 年後披露自己對於作中人物處理時的疑慮。可見，對於作中人物稱呼有所隱諱、乃至存稿遲遲不發等，無疑都是出於作者的刻意安排。

首先，有關姓氏的記載與指稱方式。《南方紀行》中部分人物以真實姓名完整呈現，而〈殖民地之旅〉的人物則多以符號代稱或改頭換面，以避免披露其真實姓名。例如，H 氏（東熙市）、M 氏（森丑之助）、A 君（許文葵）、林熊徵（林獻堂）等。其中，明顯出自作者刻意安排的手法，就是首次提到 A 君時文中稱為「某」，接著再使用括號並加入說明：（其姓氏雖然記得，但在此姑且稱他 A 吧）。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出現在 1936 年對於「鄭」的描述。可見，佐藤春夫對於臺閩所見所聞的事實與在地生活的情態都想極力保留，但卻又顧忌人物真實身分的曝光。

其中特別耐人尋味的是，作者想要遮蔽的往往僅是人物的姓名及部分身分而已。對於作中人物的性格與行為，反而大都據實紀錄，採取毫不保留的方式忠實呈現。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身分與姓名揭露最少，但隱私卻曝光最多的鄭君。

佐藤春夫於 1959 年 10 月刊行的〈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sup>64</sup> 中揭露了鄭君當年在打狗帶他去私娼寮，甚至還目睹了鄭君買春的一幕。事後，佐藤答應鄭君的央求，在其師父東熙市面前保守秘密。兩人因此事而變得關係親近起來，而佐藤後來也受了鄭君慫恿，決定前往其福建故鄉一遊。

佐藤何以認為鄭君買春的一幕曝光無妨，但身分與姓名卻不可揭露呢？

<sup>63</sup> 據〔日〕佐藤春夫：《霧社》，頁 128。該書收入各篇依序為：〈日章旗の下に〉、〈女誠扇綺譚〉、〈旅びと〉、〈霧社〉、〈植民地の旅〉、〈かの一夏の記：とぢめがきに代てへ〉。

<sup>64</sup> 參〔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 27 卷，〈羈旅つれづれ草〉，頁 277-282。

與此類似的還有鄭君的古怪陳姓友人，鄭君說他窩在廈門的私娼窟裡吸食鴉片。對於這類二手傳播，佐藤還是寫進了作品，似乎並不認為需要隱諱。

除此之外，1936年7月收入《霧社》的〈かの一夏の記〉裡也提到了鄭君。佐藤說他是「H的弟子，任技工助手的『某』本島人，常把我叫到家裡喝杏仁湯」，或是「佯稱帶我遊覽，但卻把我帶到附近的花街柳巷去」。與1959年的回顧文章相比，兩者歲月差距達20多年。但對於鄭君的真實姓名與身分，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並未加以揭露。甚至，還佯稱「鄭」為「某本島人」，顯然這也是刻意的遮蔽企圖。但就佐藤對於鄭君個人的印象與記錄而言，除了身分姓名以外，都是前後首尾一貫的。

若從佐藤與鄭君在臺灣時朝夕相處且有私交的背景看來，或許此舉是佐藤刻意為鄭享綬所做的「掩護」，以避免其學生時代的反政府活動曝光。其實，佐藤的「用心」似乎還不僅此一樁。《南方紀行》稱鄭君在臺灣投靠姊夫，但40年後的〈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卻說鄭的表妹（堂妹？）是牙醫之妻。相對於佐藤春夫對於鄭享綬其他行事記載的一致性看來，作者對於鄭君真實身分的隱匿，乃至對周坤元的全名加以遮蔽，恐非偶然所致。

其實，佐藤對於鄭君的刻意隱蔽，早已引起前人研究的興趣。如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提出，<sup>65</sup>1922年《南方紀行》與1959年〈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都曾清楚記述鄭君的背景，但1936年〈かの一夏の記〉裡，佐藤「卻刻意模糊鄭氏的出現與身分」。<sup>66</sup>此外，1937年的雜感〈廈門のはなし〉中「提到奧系軍事將領陳炯明的事蹟，但對於嚮導鄭君卻隻字未提」<sup>67</sup>。

<sup>65</sup> 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頁130。

<sup>66</sup> 佐藤春夫不挑明鄭的身分，而說他是「H的弟子，是擔任技工助手的某本島人」。參見〔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21卷，〈かの一夏の記〉，頁226。

<sup>67</sup> 筆者按：〈廈門のはなし〉中提到當日鄭君並未隨行至漳州，嚮導是廈門

邱文指其原因為中日之間關係緊張，導致佐藤避而不談。但若考慮鄭君的革命「案底」因素，佐藤不想連累鄭君可能才是實情。

## （二）異國的書寫者與在地的傳述者

若就佐藤春夫在臺閩兩地書寫的敘事內容與表現方式而言，大抵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以佐藤親身經歷為主幹的旅遊紀行，第二類則是透過當地人的傳述而聽聞的故事、逸聞、敘事等。

兩者都是透過譯者與嚮導、乃至旅遊途中結識的當地人而採集，但紀行則是將作者親身體驗的見聞，以及作者與在地民眾的互動過程與當下感受以真實的敘事加以保留。因此，提供消息與訊息內容者，往往與作者同樣進入作品，成為作中人物。而故事傳聞的消息來源則多半來自譯者或當地人，而在作者既已掌握故事的敘事內涵下，再透過相關文獻等加以驗證或充實，進而形塑為故事、逸聞、敘事等作品。此類作品的意義是透過故事與傳聞的追本溯源，探索當地民眾生活中的文化與歷史根源。

然而，兩類作品中共同的關鍵人物就是譯者。來自異國的作家若沒有一個能說好當地故事的人，讓作者體會到當地的民情風習與深刻的人我差異時，旅遊中的書寫也就無緣產生。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正是透過作者與在地譯者之間의共同行動與思想交鋒，才能呈現異國文化交會時的深度刻痕，並形成作品中令人玩味深思的文化底蘊。

就以佐藤春夫的閩地旅遊經驗為例，佐藤初見的廈門形象堪稱破敗淺陋（作中稱為「貧弱」），而見聞的又盡是煙館、私娼、骯髒的環境，所遇見的人物，有的行徑古怪、有的詞不達意。同時，與他同行

---

的日本小學老師徐朝帆、余錫華。參見〔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第21卷，〈廈門のはなし〉，頁411。而據〈朱雨亭のこと、その他〉記載，徐、余兩人皆臺灣出身，但與佐藤並不合拍，日語也不夠好，通譯時又心不在焉，難以達意。〔日〕佐藤春夫：《南方紀行》（東京：新潮社，1922年），〈朱雨亭のこと、その他〉，頁193-194。

的鄭君初到廈門之際，似乎是個十分失格的嚮導與通譯。

因為鄭君一回到福建，似乎就忘了自己當初曾經慫恿佐藤春夫來閩遊玩，落地之後既未扮演通譯或嚮導的角色，甚至有事離開之際，事前非但未告知佐藤，還將佐藤託付給完全不適任（日語極差）且又靠不住（只顧吸鴉片）的「陳」，令人對於佐藤的無助深感同情。

與在臺旅遊比較對照時，初抵閩地的鄭君確實讓佐藤春夫飽嚙語言不通之苦。但隨著旅途的進展，鄭君後來的表現也就「漸入佳境」，稱職地發揮了嚮導與通譯的角色功能。然而，佐藤對於鄭君在《南方紀行》中的人物角色，並未因其譯者角色的逐漸改善，而淡化筆下初入廈門的文化衝擊與負面印象。

可見，臺閩紀行是作者對於旅遊地的現實生活及其旅途中當下感受的真實書寫，並無加以粉飾的意圖。同時，作者對於旅遊中的時間刻度，也保持著追求精確的執著。因此，對於旅途中發生事情的前後順序與起因結果、乃至參與者的感受等，作者也都顯現不回頭修改或是不刻意模糊記憶的書寫方針。同樣地，臺灣的〈殖民地之旅〉中，佐藤春夫對於譯者或自己與他人互動時，也都是以呈現過程事實、記錄當下感受、對比今昔變化等，為其重要的書寫原則。

而閩地之旅中，由於缺乏夠格的譯者，再加上佐藤與譯者雙方皆以非母語（英語）溝通，以致文化與歷史根源豐富的故事與傳說不易表達傳述。此外，更不如在臺時期有森丑之助的蕃地專家知識與行政資源等助力，造成閩地的《南方紀行》中有關文化歷史追溯的故事傳說，僅有一篇取材自陳三五娘的〈星〉。而這篇作品其實也是漳州旅途中的聽聞轉化而成的。

佐藤春夫在臺旅行之際，借重森丑之助的專業見解與社會觀察，將其融入傳說故事的主題內涵，再藉由他人之口重新形塑為書寫的敘事，大大豐富了佐藤臺灣系列作品的內涵與數量。而臺閩紀行相互對照之下，故事傳說等在地生活與文化根源作品的薄弱，與在地譯者的認知不足顯然是互為因果的。反之，環繞在譯者關切的議題上（如陳

炯明、林季商等援閩護法粵軍在漳州的事蹟)，就直接帶動了作者的走訪，乃至形塑佐藤筆下的內容描述。

## 五、結語

臺閩紀行系列作品中，出版於1922年4月的中篇小說〈朱雨亭のこと、その他〉（朱雨亭其人與他事）——敘述了佐藤春夫離開福建一年後的回顧與感懷，尤其值得關注。而最重要的是，佐藤透露了自己何以著手紀行寫作的緣由。

佐藤春夫在進入正題之前，先以近四分之一篇幅坦言展開臺閩紀行寫作時的情緒與態度，是「抱持自暴自棄的心態而揮筆成章，並藉此忘掉今天要過的日子」。佐藤企圖以旅遊療傷，並以大量的異國書寫讓現實裡的傷心時刻在奮筆疾書中消融。雖然，「只要回憶的思緒稍有縫隙、筆尖稍有滯澀……就會回到今天（的時刻）」。因此，「為了極力忘掉現實，也不管文章的先後脈絡，拼死命地埋頭苦寫」。

本文的主角朱雨亭是養元小學校長周坤元介紹的漳州中學英語教師，文中描述佐藤與朱雨亭數度失之交臂的邂逅，以及失而復得的巧遇，見面後竟難暢所欲言（彼此英語口音濃重，造成溝通障礙），最終竟在錯愕中驟別（朱君因巨浪突襲，未能與佐藤等人登上蒸汽船，故於驚愕中別離）。離閩後佐藤遍尋不著朱氏名片，情急之下打開塵封多日、平時絕不輕易開啟的箱子。由於箱裡充滿往日書信與旅途照片等，佐藤甚至不允許自己開箱觀看。然而遍查箱中物仍不得要領之際，箱裡塵封許久的回憶——佐藤與朱的離別情景——竟又歷歷在目，於是佐藤合上兩片可自動上鎖的木箱，一時也打不開了。而就在此刻，時光的羽翼似從頭頂掠過，他的心頭不再沈重！

就這段內容看來，閩地的紀行書寫似乎為佐藤的文學與人生帶來了一體兩面的重生。臺閩遊歷與奮力書寫的過程，標誌著佐藤春夫行走在異國他鄉的軌跡。而失去了通譯鄭君同行的佐藤，無論與朱雨亭

的難以溝通，或與兩位隨行小學老師的了無交集，似也反映了佐藤與當地之間處於訊息間歇持續的情境。而最後與朱雨亭錯愕的驟別，則顯現其異國遊歷與人生旅途交集戛然終止。

可以說，臺閩遊歷的實踐與寫作固然出於佐藤與過往揮別的意圖，而投入異國的書寫更需要在地資訊的提供。而佐藤爲了讓自己得在奮筆疾書中忘卻心頭糾結的苦惱，旅行中的親身經歷與途中的聽聞筆記，成爲他源源不斷的創作泉源。反之，旅途中暫時失去譯者同行的漳州、譯者不告而別的廈門苦澀經驗，乃至最後與朱雨亭的驟別及箱子的隱喻，在在都與譯者的意象緊密連結。

日本國內對於佐藤春夫臺閩紀行文學的評價，早期有橋爪健的評論，<sup>68</sup>及島田謹二的作品分析，<sup>69</sup>他們皆將此系列作品視爲「內地文人異國情調與今昔風貌交織的外地紀行文學」，且長期形成定見。直到藤井省三提出佐藤的書寫是出於對臺灣受殖民統治的同情。迄今，藤井的論述似已成爲主流。然而，藤井的對臺同情論並未指出產生同情的緣由以及在地訊息的提供源頭等面向。

在佐藤臺閩紀行作品的重新評價上，本文試從作者與譯者的互動、作者對於譯者的書寫，以及作品內外譯者角色功能的探究等，以回溯佐藤紀行的創作過程，並透過對於譯者與譯事活動的梳理，展開與文本內容的對照與剖析。日後盼能進一步對於臺灣民間故事與傳聞逸事等佐藤文學作品，繼續以譯者與作者爲研究主題，再行精細的探索。

---

<sup>68</sup> 橋爪健〈舊さの中の新しさ 五月創作評の七〉指爲「異國情調與今昔風貌交織」。〔日〕橋爪健：〈舊さの中の新しさ 五月創作評の七〉，《読売新聞》朝刊第4頁，1925年5月7日。

<sup>69</sup> 島田謹二〈台湾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指爲「內地文人的臺灣紀行」。〔日〕島田謹二：〈台湾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臺灣時報》1939年7月號，收於〔日〕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頁254-300。

## 徵引書目

- 〔日〕池田敏雄：〈鹿港遊記〉，《臺灣地方行政》1942年8月號，頁92-104。
- 〔日〕池田敏雄：〈亡友記〉，收於吳新榮遺著，張良澤編：《震瀛追思錄》，佳里：瑠琅山房，1997年，頁119-139。
- 〔日〕佐藤春夫：《南方紀行：廈門採訪冊》，東京：新潮社，1922年。
- 〔日〕佐藤春夫：《霧社》，東京：昭森社，1936年。
- 〔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編：《定本 佐藤春夫全集》，京都：臨川書店，1998-2001年。
- 〔日〕佐藤春夫著，〔日〕牛山百合子翻刻：《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和歌山（新宮市）：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2003年。
- 〔日〕河原功：〈佐藤春夫「植民地の旅」の真相〉，收於〔日〕河原功：《台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東京：研文出版（山本書店出版部），1997年，頁3-23。
- 〔日〕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南方紀行』の中国近代（三）——東熙市と鄭享綬——〉，《實踐國文學》第84卷，2013年10月，頁50-67。
- 〔日〕河野龍也：〈佐藤春夫、台湾で居候になる—インタビュー・東熙市一家の記憶から—〉，《実践女子大学文芸資料研究所年報》第33号，2014年3月，頁278-301。
- 〔日〕島田謹二：〈台湾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臺灣時報》1939年7月號。收於〔日〕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志 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1995年，頁254-300。
- 〔日〕島田謹二：〈佐藤春夫の「女誠扇綺譚」〉，《臺灣時報》1939年9月號，收於〔日〕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

- 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1995年，頁350-385。
- 〔日〕笠原政治：〈佐藤春夫が描いた森丑之助〉，收於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編：《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和歌山（新宮市）：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2003年，頁24-32。
- 〔日〕森丑之助：〈生蕃の首狩に対する感念と其慣習〉，收於〔日〕越川良厚編：《東洋時報》第183號，東京：東洋協會，1913年，頁25-35。
- 〔日〕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注：《生蕃行腳》，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 〔日〕橋爪健：〈舊さの中の新しさ 五月創作評の七〉，《読売新聞》朝刊第4頁，1925年5月7日。
- 〔日〕磯村美保子：〈佐藤春夫「魔鳥」と台湾原住民——再周辺化されたものたち〉，收於金城学院大学編：《金城学院大学論集・人文科学編》，名古屋：金城学院大学，2006年，頁55-66。
- 〔日〕藤井省三：〈植民地台湾へのまなざし——佐藤春夫の「女誠扇綺譚」をめぐる〉，《日本文学》第42卷第1期，1993年1月，頁19-31。
- 丘塵兢：〈閩南倒袁運動記〉，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廈門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廈門文史資料》第9輯，廈門：鷺江出版社，1985年，頁1-25。
- 何丙仲：〈獻身閩南民主革命的臺胞林祖密傳略〉，收於鼓浪嶼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系列叢書編委會編：《鼓浪嶼文史資料》上冊，廈門，鼓浪嶼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系列叢書編委會，2010年，頁67-69。
- 邱若山：〈佐藤春夫「植民地の旅」をめぐる〉，《日本学と台湾学》創刊號，2002年7月，頁129-149。
-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

邱雅芳：《南方作爲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7月。

黃美慧：〈佐藤春夫與臺灣、中國——大正九年的臺福之旅〉，《東海學報》第33卷，1992年6月，頁167-184。

陳艷紅：〈日本文化人の目に映った鹿港の半世紀（1920-1976）〉，2005年9月10日臺灣大學舉辦之「天理臺灣學會第15回研究大會」，《臺灣大會記念演講及研究發表論文報告集》B6-3場，未出版。

楊承淑：〈臺灣日治時期的譯者群像〉，收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編：《翻譯史研究》第2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0-194。

臺灣新民報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

蘇薌雨、葉榮鐘、洪炎秋：《三友集》，臺中：中央書局，1979年。